

我的紅樓時代

何雙全

人的一生可以有好多個時代，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構成了人生的全部。我在紅樓僅僅六年，但那是永難忘懷的時代。因為那裏不僅是出偉人的地方，而且是我這個小小老百姓走向幸福生活的起點。在那裏我感受到了偉人的精神，在那裏我遇到了學術界的泰斗、大師、先賢，在那裏我結識到了許多志同道合、和藹可親的朋友，在那裏我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在那裏我開始了一生的事業，以至順利地走向了文博學術研究的旅途——這就是新出土居延漢簡的整理與研究。如今已臨退休之際，回憶起當年度過的2500餘天（1978.9—1984.8），當時工作的一幕幕場景，當時朝夕相處的一張張笑顏，當時完成的一摞摞文稿，當時一起排隊打飯，當時飯餘一起聊天，當時一起往返於紅樓至西四大拐棒胡同住址等等，至今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1976年9月，我從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按照“哪裏來回哪裏去”的政策規定，我回到甘肅省，組織上安排我去甘肅省博物館工作。10月，未打開行李，省博革委會派我去甘肅玉門火燒溝參加青銅時代墓群的發掘。發掘工作持續到年底。1977年上半年又派去渭源縣發掘宋墓，下半年又派往夏河拉卜楞寺調查寺院建築保護情況。兩個年頭過去了。1978年開春，派我去靖遠縣農場參加勞動，春播、夏收、秋管，農活一波接一波，全是重體力勞動，但每天伙食定量仍是八兩，年輕人飯量大，農場每天補助二兩，加起來每天一斤乾糧。勞累、飢餓，心想哪天是出頭的日子。什麼學術研究，從沒有此概念，祇盼着能早些脫苦海。也許是紅樓的靈驗吧。到了9月初，秋收始，農場帶隊通知我回蘭州。回到省博，館長吳怡如先生找我談話，說：“國家文物局要調居延新簡去北京統一進行整理，派你和任步雲二人，帶上發掘資料去參加，你是年輕人，未參加發掘，北京高手如雲，名家都集中在北京，你要好好學習，不可自大。”我喜出望外，高興異常，但又特別害怕：我的方向是史前考古。歷史考古，特別是文字文獻學底子很差，古文字認識不了幾個，古文獻沒讀幾本，逼上梁山呀。

9月12日,我與任步雲先生搭乘蘭州至北京的76次快車,經過42小時的旅行,於14日上午到達北京站。懷着忐忑不安的心走下8號車廂,向東沒走幾步,與一長一年輕兩個身着藍布中山裝的男子迎了個照面,他二人並排站,一左一右合舉一張1尺大小的紙,上面寫着“接甘肅任步雲、何雙全”,我倆上前迎合,沒等我們開口,一邊握手,一邊年紀較長的就說“我叫于豪亮”。年輕者接着:“我叫李均明,我們二人來接您們。”就這樣我第一次見到了于、李二先生。他倆那樣和藹可親,我的恐懼心去了大半。出了北京站,我們4人同行,由李均明帶路買票,乘104路無軌電車,大約1小時,到達和平裏,住進了文化部招待所,一切安排妥當,于、李二人離去。下午整理行李、資料。晚上有幸拜見了大文學家謝冰心,我們同住一層樓,她在我們隔壁,說是剛落實政策,回京不久,暫住招待所。

第二天(9月15日)早上8點不到,李均明先生已到招待所門口,接我們去整理組報道上班。於是我們3人乘104路電車到美術館下車,因距故宮不遠,走入故宮北門,徑直走到西北角城隍廟院內。當時整理組因紅樓受地震損壞,進行加固維修工程未完,仍在隍廟內辦公。辦公室設在廟內中殿,是一座清代歇山頂、三開間、五架梁建築,為擴大使用面積,前後門窗移至檐柱,並封堵,在東山牆另開一小門,作為辦公室總門。室內依4根金柱為界,南北向,用文件櫃隔開,分割成三個大通間,通間內凡能利用的空間都擺有辦公桌,僅順門口方向留出一條通道供出入。室內最裏面,又分南、中、北三個小空間,靠南窗口下2張桌,西坐邵懷民,東坐張守中,二先生是專門臨摹簡文字的;中部靠牆擺3張桌,南坐于豪亮,北坐李學勤,邊坐吳九龍,三位是簡帛組(銀雀山、馬王堆、睡虎地、定縣等);北部2張桌,西坐薛璧群、東坐胡昭靜,二位是文物出版社同仁,負責出版事宜。室內中間部位,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南部靠窗下擺3張桌,東坐張政娘、西坐顧鐵符、邊坐唐蘭。北部擺4張桌,東坐李均明與會計,西坐王嘉琪和胡繩武,四人面西相觀。室內最外面,即近門口處,又分為南北兩個小區,南部靠窗口照樣擺有4張桌,東坐唐長孺、朱雷,西坐吳震、陳國燦;北部亦有4張桌,東坐王去非、李征,西坐沙知、馬雍。這就是整理組,共有辦公桌22張,但辦公人數遠多於22這個數字,本來就非常擁擠的辦公室,我和任步雲的進入,更增加了占地面積,無法,祇好輪流使用辦公位置。任步雲安排在最裏邊,與李學勤先生共用一張桌。我無固定位置,當時唐蘭先生不常去,我就坐唐先生的辦公桌了,第二天李征先生悄悄開玩笑對我說:“小何,我們辦公室現在你的位置最高了,好好珍惜。”李先生一句話,使我為之一震,暗下決心,一定珍惜。就這樣我開始了整理組的生活。

新出居延漢簡的整理,歸入簡帛整理小組,有于豪亮、李學勤、李均明、裘錫圭、任步雲和我,全組除我外,其他先生早已是專家了,我纔從識字開始。我們先從整理破

城子簡入手，面對 500 多張黑白照片，我用一星期的時間先瀏覽了一遍，因受部分字好認的假象所迷惑，覺得好像不太難，可是進入細讀時，難題接踵而來，好像越來越不認識了，一個多月下來竟毫無收穫，我心急如焚，又不敢問人，我向李均明先生請教，李先生說：“不要急，我也是剛接觸居延簡，我們一起向于先生等先生請教，慢慢就好了。”於是我常常請教于先生，先生認真講解，耐心指導，使我獲得了重要知識和基本要領：識字，必須掌握《說文解字》、《說文通訓定聲》、《隸辨》、元刊《皇象急救章》、《中華大字典》等大量工具書的運用；瞭解歷史背景，必須熟讀前四史；瞭解釋文，必須先通讀舊居延簡，《流沙墜簡》等；研究問題，須認真閱讀已出版和發表的前輩的著作和論文。總之，居延簡內容龐雜、涉獵面甚廣，需要懂得多，需要博覽群書。于先生很謙虛，說：“我懂的也不多，好在大學者都在一起，你可以隨便向任何一位先生求教。”轉眼已到年底，春節前我回到了蘭州，總結了五個月的心得，覺得仍站在漢簡之門外。

1979 年正月十五剛過，任步雲先生因家裏有事，我先行返京。因招待所房費太貴，我就被安排在租用的北體家屬樓一小房間內。早出晚歸，往返於北體與故宮之間。我以為我到京早，其實于、李二位先生早已按時上班了。這一年也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居延組新來了謝桂華、朱國炤先生，隊伍壯大了，我們一起工作。上半年，我一心放在居延簡的認字上，一部《說文解字》，一把放大鏡，對照片天天看，字形相近的字，容易混淆的字，徹底不認識的字，會認不會讀的字，會讀不會寫的字等等，邊看邊做筆記，一一記下來，集中時間，尋找機會向先生們請教，一年下來，收穫甚豐。除正常工作外，我跟着李均明，常常騎自行車去琉璃廠中國古籍書店買書，而且往往滿載而歸，後來聽均明說，所買之書，都是張政烺、于豪亮、李學勤先生開單子、列書名，並指地點，我倆去尋找購買，所以從那時起我也學會買書了。轉眼到了 8 月份，大概是 13 日上午 10 點，也許是相約的緣故吧，各位大師都先後到達隍廟，雲集於整理組的辦公室——隍廟中殿。我記得張政烺先生最先到，然後顧鐵符、夏鼐、朱德熙、裘錫圭、李學勤等先生到達，緊接着走進來一位個子較小、身體較瘦，但神采奕奕的老先生，大家起立迎接，于豪亮先生向我介紹道，這就是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先生。真是學術界巨星的大聚會，我一一記下我有幸見到的先生們：張政烺、夏鼐、唐長孺、商承祚、朱德熙、顧鐵符、李學勤、裘錫圭、沙知、馬雍、王去非、于豪亮、邵懷民等，更熟悉了後來的大家：朱雷、陳國燦、吳震、李征、吳九龍。又結識了新朋友宋曉梅（後來她讀了馬雍先生的研究生）。大家圍坐在中間的那組辦公桌周圍，我和均明站在邊上，聽大師們談話，除問候外，談談笑話，時不時又談到學術。猛然商先生指着我說：“你還在搖籃裏，好好學習。”先生的話又一次激勵了我，此後我更加勤奮。整理組就我和均明是年輕人，當年正值籌備古文獻研究室，均明是當然的主人，我算半個。他親自設計了搬入

紅樓後的辦公桌,交由順義傢具廠訂做,我跟卡車司機去順義廠將桌子拉回北京,暫時存放於故宮慈寧宮院內,等待來年搬遷。一年又很快過去了,年底返回蘭州,向財務報賬,向領導匯報一年的工作。

1980年3月,我拿着單位介紹信,在蘭州戶口所在地的糧食局換取了半年定量(168斤)的全國通用糧票和借支的一個月工資(32.50元)後又踏上了赴京路。到京後移住到西四大拐棒胡同文物出版社家屬樓2單元5樓,與于豪亮、李征、吳震、張守中、唐雲明等先生同住同套房子的的小房間裏。不久整理組準備從故宮陞廟搬出。我們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雇用幾輛平板三輪人力車,將去年做好的辦公桌從故宮運到紅樓院內。事先說好了,三輪車夫祇管運、不管搬,我和李均明便成了主要勞力,他力氣比我大,他設計的桌子又大又笨,但材質好,且厚重,很適用於整理工作。也許是他的杰作的的原因,因此他背起一張毫不費力地一口氣背上4樓,可我不能,我要卸下抽屜,歇三次纔能背上4樓,就這樣,費了兩天時間,纔把新家安排停當。我們的辦公室安排在4樓東南拐角處的兩間大房子裏,兩間一大門,內有套間。漢簡組就設在此,裏外間均擺了4張桌,裏間落座于豪亮、李學勤、任步雲、韓自強,外間就坐李均明、謝桂華、朱國炤和我。這時名稱也改了,正式名為“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但工作無絲毫變化,整整一年全心投入破城子簡釋文,待基本形成初稿後,10月份我與李、謝、任等先生趕赴蘭州,與在蘭州的初世賓先生一起,對照原簡第一次修改了釋文。經過校釋,不但發現了新問題,而且又積累了一堆難以辨識的字。做完校釋,已近年底,于、謝、李三先生回京。我們留在蘭州,準備發掘報告編寫的事情。

1981年3月,我和任步雲、初世賓赴北京,與于豪亮、李均明、謝桂華、朱國炤一起,先從考釋疑難字入手,再次修改釋文。費時兩個月,形成最後訂稿。此時任、初二先生因其他事先行回蘭州,我繼續留京,並移往前門1號高樓1205室。此時于先生家也搬到北京,住5樓503室,李均明也分到該樓住1204室。

甘肅省博物館也很照顧我,5月初派我的妻子閻桂娣到故宮學書畫修復和裝裱,這樣我在北京有了臨時的家,早上出門我們步行,她去故宮,我去紅樓,晚上同回前門的家。我的工作和諸先生一起,整理釋文修改稿,鈔寫成正式的文稿。期間和于豪亮、李學勤等先生一起討論居延簡釋文是否標點斷句,做注問題,經過幾番討論,一致認為居延簡不同於古籍,大都是公文文書,很少有古文獻,且殘斷者多,不好標點,難以斷句,更無做注的必要,祇要掌握了各種文書的格式和規律,一般都能看懂,如標點、注釋有故弄玄虛、畫蛇添足之嫌。所以決定居延簡不標點、不斷句、不做注。可絕不是後來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居延簡釋文不標點、斷句、做注是研究上的缺陷和不足。”真是自作聰明。關於居延簡今後研究的方向需要做什麼,我向李學勤先生請教,

先生直言，新舊簡放在一起、綴合、編冊、分期斷代，先做好這些基礎工作，再找問題開展研究。我遵循這一原則一直堅持到現在，果然是受益匪淺。

7月的北京異常炎熱，古文獻的領導很關心我們，專門組織我們去承德避暑山莊休假三天，我與妻子、陳國燦、朱雷等先生一起去度假，這是我第一次游覽山莊和外八廟，被那裏各式各樣的古建築群所打動，印象至深，以至對我現在所從事的古建築保護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轉眼到了10月底，妻子的學習期限已到，我送她上火車回蘭州，我仍去紅樓工作。此時的古文獻室很是熱鬧，除了從故宮搬來的各小組外，又見到了新面孔。劉軍是第一位，她外表美麗，可能是營養不良的緣故，顯得面黃肌瘦，但穿着一身合體的軍服，顯得格外精神莊重、精明強幹，後來纔知道她是復轉軍人。起初她在辦公室工作，我們的吃喝拉雜都在她的關照之下。後來她上了大學，也進入了漢簡研究的領域。至今我還存有經她辦理的紅樓出入證和機關食堂飯票。此外還有王世襄和劉啓益二先生，王先生是文物大家，劉先生專攻商周青銅器，二先生各有特點。王先生說起文物古董，一口氣可以說出許多我從未聽過的東西，特別是講古代傢具，如數家珍，講形制、講工藝、講結構、講材質辨識……聽得雲裏霧裏，但句句都是真言，我無形中學到了不少知識。劉先生每天伏案，不停地用木質放大尺精細地繪製着每件青銅器，說起話來，先笑後言，總是笑哈哈的，好像永無愁臉。鼎、簋、盤、匜、觚、斝、盃、觥……沒有他不知曉的。還有沈建華，到得很早，不過我們第一次見面是1981年，她跟李學勤先生整理馬王堆帛書，是一位吃苦耐勞、不甘落後且很有成就的學者。此外就是姜伯勤先生，敦煌吐魯番學大家，我與姜先生還有韓白強先生後來同住前門高樓上。白天整理文書，晚上掌燈著書。我苦思寫一篇論文時，他的第一部大作已截稿。大家工作時特別認真，誰也見不到誰，祇有中午打飯時纔碰到一起，卻又互相謙讓讓對方排在前面。午飯後有一小時空閑，大家可自由走動，互相看望聊天。

一天從安徽來了一位先生，是于豪亮的朋友，會看相、算命，午飯後在我們辦公室聊天，有人建議給看看。於是幾位先生挨個兒看過，閉口無語，後給李均明先生相面、相手，說他面善心細、先苦後甜，是有福之人，但手紋奇特，注意容易傷人。均明看着自己的手掌笑着站在一邊。我走上前去，先生打量一番，未看手相，接着脫口而出，你先前多病，是雙胞胎，但老二已死，祇有你在。我一時驚訝，無言可對。均明問我是否真實，我說屬實。於是大伙兒一陣噓聲。我相信人的面相、手相能夠反映人的生死禍福。這僅是我們在紅樓工作期間的生活小景之一。

很快到了年底，1982年元旦前夜，古文獻室答謝我們，在宣武門全聚德烤鴨店安排會餐，參加者有張政烺、朱德熙、馬繼興、李學勤、裘錫圭、王去非、吳鐵梅、李征、吳

震、陳國燦、朱雷、程喜霖、李均明、劉軍、謝桂華、朱國炤、王嘉琪、邵懷民、張守中等，當時在紅樓者基本都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北京烤鴨，那場景、那美味至今令人難忘。後來得知，當時給我們主廚的是曾給華國鋒做過飯的廚師，真是榮幸。

1982年2月27日，我的姑娘出生，我與妻子都是外地人，親屬都在天水，家裏無人照顧，我祇好在家侍候。孩子出生及戶口需要起名，這是頭等大事，我急忙寫信請于豪亮先生給起個名字，十天後于先生回信，起名為“謙”，乃六十四卦之名，意思很好，即依此名之。果然不錯，何謙現在已是而立之年，為人誠實、事業有成，工作、生活已有着落，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真乃感謝早已作古的于先生，賴先生所賜吉名而帶來的幸福。

這年正因為照顧妻女，晚至5月初將家安頓好後纔到紅樓。當年有三項任務，一是破城子簡文清稿，二是確定破城子發掘報告的體例與內容，三是開始肩水金關簡文的釋讀。三項工作、三項任務各有具體分工。第一項由我、李均明負責，第二項由任步雲、初世賓在蘭州負責，第三項由于、謝、朱三先生開始。待第一項完成後，我們全部轉入第三項。金關簡有12000餘枚，原簡在蘭州，我們釋讀依據文物出版社彭華仕先生於1976年拍攝的黑白底片，放大後使用。此前甘肅省博物館於1975—1976年組織人員從考古發掘資料整理的角度，對全部簡做了逐條記錄，包括簡的長度、寬度、厚度、完好程度、書寫格式、書寫字體、每簡容字、文書類別、紀年情況、材質、形制等均一一做過記錄檔案材料。我們開始釋讀時緊緊依靠這些材料，對釋文工作幫助很大。金關簡的整理當年被列為社科“六五”規劃項目，這項工作自當年開始，一直延續到1985年時纔基本完成。後來因各種原因曾一度停止，未能正式出版。而破城子簡的釋文，1984年經張政烺、李學勤、裘錫圭、徐萍芳等先生最終審定後，於1990年先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釋文本《居延新簡》，199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全本（釋文與圖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該書的書名由張政烺先生題寫。每看到該書時，1983年我與謝桂華先生同去張先生府上懇請先生揮毫書名的場景仍歷歷在目。金關簡擱置25年後，2011年7月，我們再次校對，由上海中西局出版了第一集，先行發表簡文、圖版2000餘枚，算是給大家的交待吧。

離開紅樓已經20餘年了，居延簡的工作還尚未結束。但25年前的場景不可再現，祇能存在記憶裏。回想當初的6年生活，是衆多名家大師指點了我，培養了我，但我天生愚笨，功底很差，學業無長進，羞言難對。

願仙逝的先生們在天國幸福，祝健在的先生們安康長壽。

是為記。

（何雙全 甘肅省文物保護維修研究所研究員）

